

“民主集中派” 和“工人反对派” 文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民主集中派”和 “工人反对派”文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宁成春

“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

“MINZHUJIZHONGPAI” HE

“GONGRENFANDUIPAI” WENXUAN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46,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书号 11001·631 定价 1.75元

(只限国内发行)

前 言

“民主集中派”是在俄共(布)党内于 1919 年初产生、1920 年形成的一个反对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恩·奥新斯基、季·弗·萨普龙诺夫、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米·索·鲍古斯拉夫斯基等。因为他们几乎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讲话中都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集中制,都是一无所知”(《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45 页),所以开始是人们戏称、随后他们也就自称为“民主集中派”。列宁说,他们是一个“‘叫喊得最响亮者’的派别组织”(同上第 36 页)。

1919 年 1 月 15 日,奥新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新任务》中就已表达了“民主集中派”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认为:当时的主要祸害、造成“苏维埃政权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制的领导;为了免除这一祸害,必须逐步采取“充分的工农民主的形式”,走向“公社国家”。1919 年 3 月,在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等人公开自称“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他们认为,官僚主义已深入到一切机构,“权力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了”。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问题,坚决反对按“条条”建立苏维埃机关。1920 年 3 月,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充当了主要反对派的角色,他们作了关于经济建设问题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反对在党政机关和经济

机关中实行“一长制”，坚决主张“委员制”。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提出了《论工会》、《党的当前任务》等提纲，主张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权力，并且要求按照他们的纲领来改组整个党政机构。列宁称他们的纲领是“一种最恶劣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

由于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党内派别林立，要求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自由的论调甚嚣尘上，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解散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一切派别集团。此后，“民主集中派”作为一个正式派别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1923年的党内争论中，原来的“民主集中派”的一些骨干分子参加了托洛茨基派，在由托洛茨基主持起草的攻击党的领导的《四十六人声明》上签了名。1926年，鲍古斯拉夫斯基等人参加了托季联盟，而萨普龙诺夫等人则组织了其路线与托季联盟相类似的“十五人集团”。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反对派》的决议，除了把前者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把“显然是反革命的萨普龙诺夫集团”23人开除出党了。

“民主集中派”的骨干分子多半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所以，“民主集中派”的观点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继续，而其中又搀杂了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他们高谈“党内民主”，反对党的纪律，公开提出“党内各个派别合法化”的口号，破坏党的统一。他们攻击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鼓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他们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他们主张不断地加紧对农民实行强制，反对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他们的错误受到了列宁的批评。

但是，“民主集中派”的观点中也有一些很值得研究的东西。例如，他们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工；反对中央对地方管得太死，主张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反对军事机关干预民事机关；反对用“军事化”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等等。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某些弊病，都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党必须正确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

“工人反对派”是1919—1922年间俄共(布)党内一个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加·施略普尼柯夫、亚·米·柯伦泰、谢·巴·梅德维捷夫、尤·赫·卢托维诺夫、尤·康·米洛诺夫等。他们以工人的代表自居，攻击“党的上层蜕化变质”，说党的领导“脱离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估计不足”等等。所以，开始是人们戏称、随后他们也就自称为“工人反对派”。

1919年初，“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就已开始形成。1920年3月，施略普尼柯夫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过一个《关于俄共、苏维埃和生产工会》的提纲，建议由党和苏维埃国家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9月，在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梅德维捷夫等人正式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现。11月，他们走上了派别斗争的道路，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期间正式单独召开自己的支持者的会议。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工人反对派”提出了《国民经济的组织和工会的任务》等提纲，主张国家“工会化”，并且要求实行发展到极端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分配方法，即职工甚至家属吃饭、穿衣、住房、交通、看戏等等都不要钱。1921年3月，他们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散发了柯伦泰所写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工人反对派”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主要反对派。代

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其中指出:“‘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路线”,“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国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解散一切派别和集团之后,“工人反对派”中的多数成员同该集团断绝了联系,但它的一些领导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并且保持着自己的派别组织和活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闭幕两个多月之后,柯伦泰就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继续攻击俄共中央及其政策,并且说:“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在俄国实现复辟”。1922年3月,“工人反对派”提出了《二十二人声明》,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并且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继续充当反对派。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的决议,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开除出党,并且对施略普尼柯夫、柯伦泰、梅德维捷夫提出了最后的警告。此后,“工人反对派”就瓦解了。

如前所述,“工人反对派”的第一个主要错误是搞无政府工团主义。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组织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并且建议实现苏维埃国家“工会化”,即要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服从工会。他们主张:“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一切经济的职务的任命,都要在工会的同意下进行。工会提出的人选不得撤换”。“工人反对派”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就是搞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主义是一种鼓吹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潮。波兰的社会主义者马哈伊斯基及其追随者洛津斯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版的《脑力工人》和《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等著作中,提出一种“理论”,说知识分子是靠

工人的劳动养活的寄生阶级，并且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欺骗等等。“工人反对派”拣起了马哈伊斯基主义的货色，极力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工人反对派”认为：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讲的那样，“皮匠师傅烤馅饼，馅饼师傅缝皮鞋——一事无成”；“这些人只能成为新制度的掘墓人，而决不能成为新制度的建设者”。与此相适应，“工人反对派”大搞唯成分论，提出了各级领导机关“工人化”的口号。

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号召：“同工人反对派（上层）的工团主义和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思想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78页）。但同时列宁也肯定他们“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有功劳”，并且说：“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7、246页）

“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在一系列问题上互相支持的，例如二者都鼓吹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合法化，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排斥知识分子等等。但二者又有矛盾，互相攻击。“民主集中派”视“工人反对派”为异端。“工人反对派”则认为“民主集中派”也属于“官方”派别。

三

这两个派别搞派别活动的高潮，是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党内进行工会问题争论的时期。但是它们所阐述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关于工会问题，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党的建设、领导体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等各

个方面。

这本文选收集了两个派别发表的各种文件以及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小册子和讲话等，分别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都是全文。文选反映了两个派别的主要观点，为研究这两个派别以及研究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论提供了一部分第一手资料，并且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当时列宁的有关著作的参考。

文选由杨彦君编译。个别文章是何宏江、梁桂棠、孔熙忠翻译的，均已在篇末署名。

编 者

1983年2月

目 录

“民主集中派”文选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	恩·奥新斯基(3)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组织问题时的发言	季·弗·萨普龙诺夫(17)
关于经济管理问题	恩·奥新斯基(21)
劳动义务制和军事化	弗·米·斯米尔诺夫(29)
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	恩·奥新斯基等(32)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季·弗·萨普龙诺夫(35)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副报告	恩·奥新斯基(40)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经济建设问题时的发言	季·弗·萨普龙诺夫(55)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经济建设问题时的发言	弗·米·斯米尔诺夫(60)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和提出的决议案	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65)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副报告	季·弗·萨普龙诺夫(79)

一个迫切的任务	弗·米·斯米尔诺夫(87)
关于调节农业的问题	恩·奥新斯基(93)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	恩·奥新斯基(99)
论工会(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	(111)
党的当前任务(主张“民主集中制”纲领的一派 同志的提纲)	(116)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 建设问题的副报告	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122)
主张“民主集中制”纲领的一批代表提出的第十次 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草案	(133)
农业合作社与贫苦农民	恩·奥新斯基(144)
怎样对待农村合作社的建设?	恩·奥新斯基(149)

“工人反对派”文选

论专家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57)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党的建设的 当前任务时的发言	尤·赫·卢托维诺夫(162)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党的建设的 当前任务时的发言	谢·巴·梅德维捷夫(164)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讨论党的建设的 当前任务时的发言	亚·米·柯伦泰(166)
国民经济的组织和工会的任务(施略普尼柯夫 的提案)	(167)
工会的任务(工人反对派的提纲)	(173)
工人反对派	亚·米·柯伦泰(183)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 报告时的发言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33)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 报告时的发言	尤·康·米洛诺夫(241)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 报告时的发言	亚·米·柯伦泰(245)
“工人反对派”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 出的关于中央的总结报告的决议案	(250)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建设问 题时的发言	谢·巴·梅德维捷夫(252)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建设问 题时的发言	亚·米·柯伦泰(257)
“工人反对派”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 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案	(261)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会 问题的副报告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69)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会 问题的总结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79)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列宁《关于 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时 的发言和提出的决议案	谢·巴·梅德维捷夫(284)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列宁《关于 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时 的发言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289)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亚·米·柯伦泰(293)
二十二人声明	(298)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 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300)

向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 谢·巴·梅德维捷夫(311)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监
委的报告时的发言 亚·米·柯伦泰(313)

本书作者简介.....(319)

“民主集中派”文选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所作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

(1919年3月22日)

恩·奥新斯基

同志们,我们在解决组织问题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现在深入到了我们的一切机构的官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纲领中提到了官僚主义的复活,纲领指出其原因是:一方面,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依靠的觉悟工人人数不多,他们的文化程度又不高;另一方面,必需利用我们的旧官吏,而他们又是世界上最坏的官吏。因此,我们的各个机构的人员充满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其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经常谈论的我们的苏维埃机器的机构上各种大大小小的缺点。

可是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建立这个机器、这个机构的草图、图纸本身,有没有一些被客观地塞进了这个图纸的缺点呢?有这样的缺点。官僚主义复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大约从去年春天起至今年年底止这个时期内所看到的一个现象的发展。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共和国的立法权越来越集中于各执行委员会中,或者甚至集中于拥有无限权力的个别人手中。当我们在革命初期谈论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我们总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旧的资产阶级的分权原则——执行权和立法权分立——对我们没有意义。根据资产阶级法学家的学说,把各种权力结合在一起会导致专断。但是,这仅仅对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意义。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制

中，立法权和执行权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假使劳动人民本身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假使他们通过广泛的苏维埃网来行使这种权力，那么，由于把各种权力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专断，将是对自己的专断；然而，众所周知，这种“专断”谁也用不着害怕。

但是，只有在一个假设之下，所有这一切才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即使权力是集中在经选举产生的一些委员会的手中，就象我们在初期的情形那样。经选举产生的组织解决一切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这些组织非常接近居民，它们的权力直接来自居民。从上到下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经选举产生的这些组织的手中，而且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专断、任何官僚主义都没有存身之处。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另一种倾向产生了，加强了：权力被集中到了一些非常狭小的组织、仅仅是执行机关，甚至是个别人的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假使在这方面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假使容许对于这个时期来说是过分的权力集中，那么机构的图纸本身就有不正确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一些消极现象的发展，这就一定会导致政策中个人手段的发展，导致官僚主义。任何人都有弱点，如果没有公开的监督和同志式的检查，结果人就会不知不觉地腐化起来。只有在不超过限度，只有在异乎寻常的局势以及力量的极度紧张防止官僚主义的感染时，才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而且这里必须指出，在我们这里权力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了。恰恰是在这方面的必要性已开始减少的时候，个人政策和官僚主义却开始在我们这里发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导致官僚主义复活的，不仅有我们的党纲中提到的那些原因，而且还有我指出的这个原因。当我们提出如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指出这个另外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一系列的斗争手段。